

X I N

G U O X U E

Y A N J I U

新国学研究

- 王富仁
从孔子到孟子
- 卓振英
《楚辞》新考五十例
- 赵 斌 张睿丽
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研究
- 张惠民
四库馆臣之词学观
- 李定广
由中晚唐诗词关系看曲子词的演变轨迹
- 沈卫威
学分南北与东南学风
- 王宏志(香港)
“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
- 熊金才
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的文化悖论
- 张寿洪(香港)
香港语文校本课程发展的源起和实践
- 鲍国华
鲁迅中国小说史研究系年

第 4 辑

X I N

G U O X U E

Y A N J I U

新国学研究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第 4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国学研究. 第4辑/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02-005482-X

I. 新… II. 汕… III. 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IV.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1594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王景林

新国学研究(第四辑)

Xin Guo Xue Yan Jiu
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92千字 开本640×965毫米 1/16 印张29 插页5

2006年7月北京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5482-X

定价 46.00元

编者的话

“新国学”是在原有的“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也仍然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大陆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发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

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

由于人手不足,《新国学研究》暂时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

《新国学研究》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目次

王富仁

从孔子到孟子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 (1)

卓振英

《楚辞》新考五十例 (104)

赵斌 张睿丽

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研究 (135)

张惠民

四库馆臣之词学观 (182)

李定广

由中晚唐诗词关系看曲子词的演变轨迹 (208)

沈卫威

学分南北与东南学风

——现代大学学术的南北差异 (240)

王宏志(香港)

“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论卞之琳的创作、翻译

和政治 (291)

熊金才

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的文化悖论 (322)

张寿洪(香港)

香港语文校本课程发展的源起和实践 (376)

鲍国华

鲁迅中国小说史研究系年 (414)

从孔子到孟子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

王富仁

一

随着宋明理学的昌盛,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就是以“孔孟之道”的形式保留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之中的,可见孟子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与其说是以孔子思想为基础具体建构起来的,还不如说是以孟子思想为基础具体建构起来的。孔子与老子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两个并列的原点,老子是在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区别中建构起自己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孔子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中建构起自己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但是,从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

原点出发,都能够有无数个发展演变的方向,因而也可以形成无数个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像韩非子所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皆自谓真孔”,孔子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①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个文化支点的确立。两点之间才能连成一条直线,才能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也才有一个大致确定的发展方向,并与其他的文化传统严格区别开来,使其后来的追随者能够有较为分明的“正统”与“异端”的感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在后代的追随者不断抵制、反对并排斥异端学说,维护、坚持并发展自己的“道统”的过程中存在并传承下来的。但在这时,决定这种“文化传统”基本性质的已经不是它的文化原点(因为在它的基础上是可以建构起无数个不同的传统,因而也可以从无数个角度概括它的基本性质的),而是它的第二个文化支点。这个支点是以自己的需要解读文化原点的意义和价值的,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具体到我们理解中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如果细心体察,我们就会感到,我们往往不是依照孔子的思想需要感受和理解孟子的思想学说,而是常常依照孟子的思想需要感受和理解孔子的思想学说,其中也包括对孔子思想学说中一系列思想概念的感受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与其说传承的主要是孔子的文化思想,不如说更是孟子及其后代儒学家的文化思想。

孟子的思想学说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第二个文化支点,是由唐代儒学家韩愈给我们确立下来的,这同时也形成了我们对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具体感受和理解。“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

^① 《韩非子·显学》。

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 这个儒家文化传统的谱系是将孟子的思想学说抬到与孔子同等崇高的地位为其主要特征的。“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② “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③ 恰恰是孟子,赋予了韩愈感受和理解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形式。宋明理学家则是在孟子思想学说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演绎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所谓“天”,所谓“性”,所谓“理”,所谓“心”,这些宋明理学的“关键词”,都不是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主要概念,而是演绎的孟子思想学说中的哲学命题。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向我们表明,我们关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观念,并不像一个朝代的帝王谱系那样是以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为根据的,而只是韩愈和宋明理学家对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一种编码方式和阐释方式。它是通过强化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的本质联系,而弱化孔子思想的其他传承者与孔子思想的本质联系的方式而具体建构起来的。直至现在,我们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孔子思想同孟子思想简单等同起来,似乎二者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其间的不同仅仅是具体内容上的不同,并且主要反映着孟子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但是,只要我们超越于韩愈和宋明理学家为我们确立的关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固有观念,而把中国思想史视为由众多独立的思想家共同构成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孟子思想和孔子思想在极其相近的表面形式下,是包含着极其不同的实质性内容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学说,而不只是一种思想学说之中具体内容的简单积累。假若说孔子在其整体上就是一个“人之师”,孟子在其整体上就是一个“君之师”(“国师”);假若说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其整体上讲的就是“人之道”,孟子在其整体上讲的就是“君之道”、“王之道”(“王道”);假若说孔子通过对“人”、对“人”的社会性的感受、认识和思考,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社会学说,

① 韩愈《原道》。

② 韩愈《读荀》。

③ 韩愈《送王秀才序》。

孟子通过对“君”、对“王”的批评和建议建构起来的就是他自己的
一种国家观念和政治理想。作为思想学说,它们甚至并不真正属
于同样一个思想范畴。

在我们过去研究一种思想学说的时候,往往仅仅注重一种思想
学说产生的政治背景,以及这种思想学说在历史上的政治价值和
意义,有时则仅仅局限于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分析 and 研究。
显而易见,仅仅在这样一个范围中,我们是无法发现孔子思想和孟
子思想的本质差别的。我认为,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是文化自
身的演变和发展。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书面文化尚处在“乍暖还
寒”的早春季候的时代。孔子是最早通过历史典籍、历史传说和现
实知识的广泛学习而开拓了自己的思想视野和文化视野的知识分
子,从而也建构起了与社会一般人所迥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
观念。带着这样一些观念,他也曾想服务于现实政治,走仕途之
路,但他的思想观念、他的“道”,已经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发生了严
重的分裂,周游列国的经历不是使他积累了更多的从事现实政治
斗争的经验,而是更加强化了他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作
为一个具有更宽阔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的知识分子,他的价值
和意义不是被政治家首先感觉到的,而是被他的那些学生们首先
感觉到的。他们是一些渴望成长、渴望发展、渴望成为更加健全
的人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聚集在孔子的周围,不是因为孔子有实
际的政治权力,也不是因为孔子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因为崇敬
孔子这个人,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像孔子这样一个有知识、有思
想、有道德的人。与此同时,孔子也是依照他的“人”的观念而引导
和培养他的学生们的,其中也广泛涉及国家政治的问题,但这也是
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表达的是他自己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观念。
孔子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得到更
加充分的表现的。孔子对于自己的思想是有自信力的,但这种自
信心来自于他对自己的思想价值和意义的感受和体认,而与个人
在中国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还不可能清醒地

预见到他所开创的知识分子文化历史在未来的伟大发展,更不会将自己想像成一个至高无上的“圣人”。他是以自己想像中的古代贤明的政治帝王为自己的榜样的,也将自己的思想附着在这些圣王身上。他甚至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出来,著之竹帛,使之世代流传下去。他的言行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们记述下来的,他们之所以记述它们是因为孔子的这些言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到他们社会观念和人生观念的建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孔子思想是围绕着“人”和“人”的成长的观念展开的。他是“人之师”,讲的是“人之道”,是从“人”的成长和发展出发的。假若说鲁迅思想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立人思想,孔子思想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立人思想。

我认为,孔子的更大历史作用,在于唤醒了“士”这个社会阶层的生命自觉,同时也激发了它的创造力量。在孔子之前,在“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五个社会阶层中,可以认为,“士”对于现实社会是最不具有重要性的一個社会阶层。“庶民”是当时社会的底层,但又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它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命脉。尽管作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社会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作为整体的“民”却是历代政治统治者都无法忽视、不能忽视的。“天子”曾经是整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起着控制和管理整个社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失去了自己的绝对控制权,但仍然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象征,当时的社会还不能无视他的存在。随着“天子”绝对控制权的丧失,发展起来的是各个诸侯国的统治权力。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权力集团,是由国王与大夫们构成的。不论在整个中国社会还是在本诸侯国内部,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唯独“士”这个社会阶层,既不是一个生产者阶层,又远离了政治统治的权力集团,在当时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的重要性。在当时社会上,“庶民”人口数量的增加,标志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而实际参与国家管理以及政治权力争夺的贵族集团的人物,则是极少的人数。贵族集团几乎像排泄粪便

一样将自己的远房亲属不断排泄到“士”这个社会阶层中来,使之成为当时社会一个尾大不掉的赘瘤。孔子作为一介布衣,通过与书面文化的结合,神奇般地上升到社会领袖的地位。“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① 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天子”或诸侯国的国王。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上,孔子就是“士”这个阶层成员的一个“光辉榜样”。孔子的出现,像一道亮光一样为“士”这个阶层的成员劈开了一条通往成功之路:通过掌握文字语言、通过历史知识和现实社会知识的广泛学习,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观念,从而将自己提高到与当时的贵族成员同等甚至更重要的社会地位上来。在“士”这个阶层的越来越多的成员,充满雄心壮志,大踏步地走到社会前台来的时候,也正是各个诸侯国的国王逐渐陷入更加严重的政治困境中的时候。越来越激烈的列国争战和越来越残酷的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各个诸侯国的国王再也不能仅仅按照传统的习惯治理自己的国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力。对于那些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并在社会上享有极高威望的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点尊敬,有了一点重视。在当时各个诸侯国国王之间,“礼贤下士”不但是一种现实的需要,甚至还成了一种风气、一种习惯。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在孔子之前,社会上只有一种主要的价值观念,那就是按照政治等级感受、看待人的存在价值的观念,即使萌芽中的道德标准,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身上,也还和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孔子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单一的社会结构,将道德从政治关系中完全脱离开来,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标准:“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① 这就在观念上将像孟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上升到了与政治君王平等的地位上:“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② 孟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境况下走进中国社会的。“……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③

这是一种由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的变化,而这种社会的变化又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扩大。凡是一种充分展开的思想,都是在一个更自由的语境中产生的。没有这样一种语境,这样一种思想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而无法得到充分表现的思想是无法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的,因而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独创的思想。这样,不同语境产生的独创性思想也就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在与各个诸侯国王的交往中还不能不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当时的君主在知识分子面前还没有那么恭顺谦卑,当时的孔子在君主面前也还没有那么气盛神旺。孔子在与君王们的对话关系中还没有充分表现自己思想的自由。“道不同,不相为谋”^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⑤,“君子思不出其位”^⑥,是孔子在现实政治关系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使他的思想主要停留在一般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层次,而不可能进入到国家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层面。他的自由是在他与自己的学生们的关系中取得的,因而他的思想也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孟子的情况则与之不同。“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⑦ 他

①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246页,1958年版。

④ 《论语·卫灵公》。

⑤ 《论语·泰伯》。

⑥ 《论语·宪问》。

⑦ 《孟子·滕文公上》。

已经有了做“王者师”的资格和意识,这使他在与各个诸侯国王及其王公大臣的关系中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自由。《孟子》全书首先给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不是孟子更加有求于各个诸侯国王的赏识,而是各个诸侯国王更加有求于孟子的知识和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孟子几乎是酣畅淋漓地展开了自己关于国家、政治的思想见解。假若说孔子是从政治庙堂开始而最后落脚于社会教育,孟子则是从社会教育开始重新返回了政治庙堂。虽然他也像孔子一样终生未得君主们的赏识,但至少在精神和气势上却是不让于那些政治统治者的。它反映着孔子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影响力的扩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反映着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统治集团在内外两个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我认为,正是这种由书面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士”这个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语言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思想学说在本质意义上的不同。

二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①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②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

① 《孟子·万章下》。

② 《孟子·公孙丑上》。

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①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②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③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④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

①③ 《孟子·公孙丑上》。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④ 《孟子·离娄下》。